

数字文化遗产的再生：人工智能如何重构文化记忆

庄惠壹

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长春 130117

摘要：文化记忆从来不是静态的档案，而是社会不断重写的文本。人类对过去的理解始终受到媒介和技术的影响。文字的出现使仪式与故事得以延续；印刷技术将思想扩散到更广阔的空间；摄影和影像技术让时间凝固为可回放的经验。在每一次媒介革命中，文化记忆的形态和逻辑都发生了深刻变化。当人工智能介入文化生产的核心时，数字化曾被视为对文化遗产的拯救，将濒危文物、档案和影像保存于无损格式之中。然而，数字保存并不意味着记忆的永恒。数据在存储、迁移、更新中不断重组，人工智能的加入使记忆不再是单纯“被动留存”的影像，而成为“可生成”“可演化”的智能实体。人工智能通过算法学习和生成技术，让过去的文化片段以新的方式复活，并与当下语境互动。这种转向标志着文化记忆从以人类为中心的静态保存，进入算法主导的动态再生阶段，改变了人类对历史、文化和自我认知的理解。在这种背景下，研究数字文化遗产的再生与人工智能的介入，不仅具有理论价值，也涉及现实社会的文化策略。它关乎记忆的真实性、文化的延续性以及人类与技术共同构建历史的可能性。理解人工智能在文化记忆中的角色，有助于厘清未来社会在技术伦理、文化保护和身份认同上的复杂问题。

关键词：数字文化遗产；人工智能；媒介

一、人工智能与文化记忆的权力结构

历史书写始终是一种权力行为。谁掌握叙事权，谁就塑造了集体记忆。在人工智能介入文化领域的今天，这一权力结构出现了新的维度。算法不再只是工具，而成为“选择性记忆”的中介。它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学习、分析和生成，形成隐性的记忆逻辑。这种逻辑决定了哪些文化符号被保存、哪些被强化、哪些被忽略，而这种选择并非中立，而是嵌入了训练数据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偏向、历史价值观以及当代意识形态。这种算法权力在表面上显得无形、客观，实则深刻地介入了文化记忆的形成过程，使文化遗产从人类中心的被动记录，转向技术主导的主动生成。当人工智能参与博物馆展览、文物修复或虚拟重建时，它不仅是技术执行者，更承担了文化阐释者的角色。AI生成的复原影像或数字文档，其选择的色彩、形态、语境和细节，都带有算法的偏好和训练语料的文化印记。这意味着，历史在被再现的过程中，不仅通过物理证据，也通过数据集和模型参数的选择被塑造。记忆生成部分脱离了人类主观控制，算法成为文化叙事的新史官。这一变化提示我们，技术的中立性往

往是幻觉。人工智能在文化再生中所呈现的“客观性”，实际上是一种嵌入式文化选择，是对历史的一种再创造，而非单纯复制。每一次AI的生成都是对过去的再阐释，每一个细节的生成都潜藏着选择与排除的逻辑。

算法在文化记忆中的权力不仅体现在再现的层面，更深刻地重塑了社会感知和记忆的结构。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化影像、文本和叙事往往与当代社会的审美、伦理和认知逻辑契合，使历史不再是单一的过去记录，而是被当下的价值观、视觉逻辑和文化期待重构的文本。在这一过程中，记忆不再静态，而是动态生成的、可塑的和可演化的。这种动态性意味着文化记忆具有延续性，同时也包含了创新性。过去的意义在算法生成中被不断调整和重新编码，而集体对历史的理解也因此呈现出流动性和多元性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算法赋予了文化记忆一种“选择性权力”，这种权力往往无形且难以察觉。AI在筛选和生成过程中，可能强化某些文化叙事，同时削弱或忽略其他声音，这种机制可能在无意中重塑历史观和社会认知。例如，在全球化语境下，算法倾向于选择易被接受或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文化元素，而对边缘文化或非主流记忆呈现则可能被弱化。这意味着，人工智能不仅在生成文化影像，也在塑造文化的优先级和价值体系，集体记

作者简介：庄惠壹（2002年10月28日-），性别：女，民族：汉族，籍贯：吉林省长春市，学历：本科。

忆正逐渐向技术驱动的生成模式转变。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提出根本性问题：我们是否仍然拥有解释过去的主导权？人工智能是否在无声中介入历史叙事，从而重塑社会自我理解和集体认同？当记忆不再完全依赖人类的选择，而由算法驱动生成，我们如何区分真实与生成、原始与衍生？算法成为文化记忆的中介，这种技术介入使得集体记忆不仅依赖于历史事件本身，也依赖于数据与模型的选择逻辑。换言之，过去的意义不再单由人类社会塑造，而是在算法与人类互动中不断生成和演化。

人工智能在文化记忆中的权力，也引发了对历史主体性和社会认同的反思。传统文化记忆强调人类主体的经验、价值观和选择，而算法生成的记忆呈现去主体化特征，使人类在历史书写中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。这种挑战不仅是技术性的，也是哲学性的：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在文化认知和记忆生成中的角色，以及技术与人类共建历史的可能性。在未来社会中，文化记忆可能不再是人类的独占领域，而是人机协同的动态产物。理解这种转变，对于文化保护、历史教育以及社会认同的建设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。人工智能作为“新史官”，不仅改变了文化记忆的生成方式，也深刻重构了记忆的权力结构。它通过算法选择、生成和强化特定的文化符号，使记忆成为可塑、可演化的动态系统。历史不再仅仅是过去的记录，而是当下与未来共同作用下生成的文本。面对这一变化，人类必须重新审视对历史的主导权、对文化的理解方式，以及对集体记忆的责任。人工智能在文化记忆中的角色，既是机遇，也是挑战，它迫使我们在技术、伦理和社会认同之间寻求新的平衡。

二、数字遗产的流动形态：从档案到生成体

传统文化遗产往往依附于物质载体：碑刻、卷轴、书籍、建筑。物质性使文化记忆具有稳定性与可感知性，但同时也局限了它的传播范围和可访问性。数字化技术打破了这一局限，将文化遗产从物质束缚中解放出来，使其进入信息流动空间。通过数字化，文物、文本和影像不仅可以被保存，还能够以可检索、可分析、可重组的形式存在。然而，数字化本身仍然是静态的，它只是将文化遗产从物理世界迁移到数字世界。人工智能的介入，使数字化的文化遗产进入动态生成阶段，从被动存档转向主动再生。

在数字平台和虚拟空间中，人工智能能够分析遗产数据、识别缺失部分、补全细节并生成新内容，使文化遗产在技术框架下获得“延展生命”。这种再生不仅是对

过去的保存，更是对文化的延伸和创新。人工智能能够通过算法推演遗失文物的形态、再现古代语言的语音和表达，甚至模拟历史场景的空间布局。这意味着文化记忆的存在不再依赖于原件，而是通过数据和算法生成的形式被不断延续。记忆不再是被动记录的历史，而是活生生的动态生成体，它随着技术更新而不断演化。然而，这种再生也带来新的思考。首先是真实性问题。AI生成的文化遗产在形式上可能接近原貌，但其生成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模拟和重构，算法在训练和生成中带入了现代审美、数据选择和设计偏好，使“再生”记忆与原始历史存在差异。其次是文化边界问题。数字文化遗产可以跨越地域和时空传播，使不同社会、不同背景的人共享记忆，但同时也可能弱化地域性和历史语境，使记忆从特定社会环境中脱离出来。文化不再依附于特定社会的经验，而是成为全球化语境下可生成、可消费的产品。

数字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已经从“保存”转向“再生”，从“过去”转向“未来”。人类在这一过程中不再仅仅是文化的守护者，而成为算法协作的共同创造者。文化的边界由此变得流动化，记忆从线性延续转向网络化、多维化和可演化状态。在这一生态中，每一次生成都是一次对历史的再阐释，每一次交互都是文化意义的再创造。数字文化遗产不再是被动的存档，而是具有潜在生命力的存在体，它在信息空间中延展、迭代、甚至可能超越原始历史的局限性。这种转变不仅是技术创新，更是文化逻辑的重构，为人类思考记忆、历史与未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。

三、人工智能的伦理张力

人工智能介入文化记忆的生成，带来了深刻的伦理张力和社会哲学问题。首先，真伪问题凸显。AI生成的文化内容可能高度逼真，但其本质是算法推演而非历史记录。它能够重现消失的文物，也可能创造全新“历史片段”，使人难以辨别真实与生成之间的界限。这种模糊性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记忆与真实性的关系。传统文化保存强调对历史事实的尊重，强调对物证和档案的忠实呈现，而在人工智能时代，记忆生成不仅是被动的记录，更是一种主动的创造行为。AI通过算法推演对历史的再构造，将过去以符合模型逻辑或现代审美的方式呈现，使历史和记忆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可塑性。这意味着，记忆的真实性不再完全依赖于物理证据和人类经验，而是部分依赖技术选择和算法设计。这对社会认知提出根本挑战：在技术介入下，我们如何判断哪些文化记忆是值得

延续的历史真实，哪些仅是算法生成的附加物？这种界限模糊，使传统以真实性为核心的历史教育、文化研究和公共记忆体系面临新的困境。

其次，归属问题日益突出。数字文化遗产的生成涉及多重主体，训练数据提供者、算法设计者、平台运营者、用户参与者，甚至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国际观众。生成结果的所有权、解释权和传播权因此变得复杂交错。AI生成的文化内容可能同时属于多个利益相关方，或处于一种去中心化、共享式的状态。这种模式模糊了传统文化所有权的边界，也削弱了集体记忆的单一权威，使文化主体性受到挑战。在这种背景下，社会必须重新思考：记忆的归属权如何界定？谁有权决定哪些文化记忆应被保留、如何被呈现、如何被传播？如果缺乏清晰的伦理框架，技术生成的记忆可能被商业利益或算法偏好所主导，从而改变公共历史认知和文化遗产的结构。

人工智能对记忆的塑造，也深刻影响了人类自我认知与社会身份建构。当AI生成的记忆逐渐成为主流信息来源，人类对历史的理解、对文化价值的判断以及对社会规范的认知，可能在潜移默化中被算法逻辑所引导。记忆不再完全依赖经验，而是部分依赖算法推演，这使得传统记忆的主体性在技术生态中被稀释。社会的历史认知不再完全由人类经验塑造，而是与算法生成的文化再现共同构建。这种变革不仅是认知上的，更涉及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调整。谁掌握算法，谁就拥有塑造文化认知的能力，技术由此成为新型权力工具，参与历史叙事和文化记忆的再造。

AI生成的文化记忆还涉及公平与多样性问题。算法倾向于优先选择常见、可识别或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文化元素，而边缘化、弱势或非主流文化往往被忽略或弱化。这种选择性再生不仅可能强化文化主流，也可能导致文化记忆的偏向性和单一化，削弱社会对历史的全面认知。在全球化和数字化加速的语境下，这一问题尤为突出：技术生成的文化记忆可能跨越地域、语言和社会背景流通，但在去语境化和标准化过程中，也可能消解历史复杂性和地方性特色。如何在保证记忆延展性的同时兼顾文化多样性、尊重历史脉络和社会公平，成为数字文化

遗产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伦理核心。

四、最终：从记忆的修复到意识的共生

人工智能能够在数字空间中延展文化遗产，使其超越物理与时间的限制，使过去的文化在未来语境下获得新的价值。然而，这种延展性伴随着风险：如果缺乏对生成过程的理解与规范，记忆可能被算法偏好和数据选择所主导，导致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偏移。因此，人工智能的再生能力必须与人类的价值判断、伦理意识和社会共识相结合，形成有机的共生关系。未来的数字文化遗产生态，将呈现高度网络化、互动化和智能化特征。人类通过算法调控、批判性介入和价值选择，成为生成过程的共同参与者。这种人机共生模式，使记忆具有持续更新、灵活重组和跨主体共建的能力。数字文化遗产的未来还意味着文化意识的全球化流动。算法生成的文化记忆能够跨越地域、语言和社会背景，使更多人参与文化共识的形成。但这种流动也带来风险：文化差异、历史语境和价值观可能在全球化算法中被弱化。如何在全球共享和本土文化保护之间保持平衡，是数字文化遗产研究必须面对的长期问题。人工智能的再生能力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延展机会。记忆不再是静态档案，也不再仅依赖人类经验，而是成为人机共生的动态生成体。通过这种共生，人工智能的加入，让记忆成为可演化的生态系统，使文化的延续与创新在技术与人类智慧的互动中实现平衡。数字文化遗产的再生是技术革命，更是文化哲学和社会认知的深层重构，是人类在技术时代理解自我、延展历史与塑造未来的核心实践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祁天娇. 数字文化遗产中的数据生命周期：一项基于文化和科技链条式融合的考察[J]. 求索, 2025, (03): 181-192. DOI: 10.16059/j.cnki.cn43-1008/c.2025.03.039.
- [2] 田国庆, 周文泓. 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策略研究——基于“迈向国家宝藏·虚拟利物浦双年展”项目的启示[J]. 北京档案, 2025, (02): 32-38.
- [3] 倪童. 数字人文研究在文学领域的研究现状与前瞻[J]. 山西档案, 2024, (05): 84-87.